

# 默然凝视川端康成的世界

——日本发现川端康成临终前书简 □魏大海

川端康成是活跃于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时代(1926-1989)战前战后、置身于近现代日本文学顶点的作家,他以卓绝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给世界各国读者留下深深的感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除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59年的歌德奖、1960年的艺术文化勋章、1962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等。重新回顾川端康成的文学业绩及川端文学的研究史,对于把握20世纪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十分重要。

20世纪初,川端康成跟横光利一创刊了《文艺时代》杂志,借鉴西方的先锋派文学创立了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在欧洲的达达主义影响下,在以“艺术革命”为指向的前卫运动触发下,《文艺时代》与同年6月无产阶级文学创刊的《文艺战线》,形成了昭和文学的两大潮流。但“新感觉派”文学在日本文坛是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后期川端更多体现出日本式的唯美主义文学特征,小说富于诗性、抒情性,也有庶民性(浅草物)色彩浓重的作品且有“魔术师”之谓即行化发展了少女小说等样式。后期许多作品追求死与流转中的“日本美”,有些作品将传统的连歌融入于前卫性,逐渐确立了融合传统美、魔界、幽玄和妖美的艺术观或世界观。他对人间的丑恶、无情、孤独与绝望有透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不懈探求美与爱的转换,将诸多灿烂的名作留在了文学史中。不过,新感觉派时代的川端康成与其说是小说家不如说是理论家。其种种言说中可以看出,那是哲学、美学或西洋式的东西。其中有克罗斯齐的形象即“表现即艺术”,也有精神分析学的“自由联想”。川端康成还对当时日本文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自然主义文学诉诸了批判,称之为过时的客观主义。他在《文坛的文学论》中呼吁,当今世界追求的是伟大的新的常识即所谓明日的常识,此外新时代的文艺关联于哲学且须取代旧世的宗教。川端康成主张艺术与哲学结合担负起宗教的功用。

1930年,川端康成一度加入中村武罗夫等组成的“十三人俱乐部”。俱乐部成员自称是“艺术派十字军”。同年11月在《文学时代》发表的《针与玻璃与雾》,据称受到乔伊斯的影响,采用新心理主义的“意识流”手法。1931年1月和7月,在《改造》杂志发表了相同手法的《水晶幻想》。该作灵活采用了时间、空间无限定的多元性表现,体现了川端康成实验性作品特定的高度。三岛由纪夫说,从“天性”上讲,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本同“人工”性写作倾向的作家,但横光却在苦斗中不知何时令自己天生的感受性过度接近“知性”或“西欧性”,继而沉迷于“地狱”和“知性迷惘”中,终于误读了自己天赋的才能与气质;而川端康成的小说《禽兽》,却被称作一部“极限接近知性的作品”,他在那里窥测“地狱”,在临近地狱时适时转身,远离了“知性”、“西欧式”和“批评性”却完整保持了“感受性”,保持了情念、感性、官能的自身的法则。《禽兽》之于川端是一部分水岭式作品,川端初次在那样的作品中直视了“迄今仅凭感觉纵横裁断的日本现实,或现实本身赤裸裸全无变化的可怖的形态”,在此意义上这是一部极端重要的作品。有观点称,川端康成并非“处事精明”,他“是一个俊敏的批评家,作为批评家比乍一看理性面对重大问题的横光利一更加优秀”。上述说法,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个的定论。

1914年5月25日凌晨2时,与川端康成相依为命的祖父逝世。祖父有志于中国风水学和中药研究,却未能实现世间推广的志向。祖父的喜好与过世对川端的性格形成乃至文学特征都有影响。川端日后的小说《十六岁日记》正是祖父患病卧床期间的日记,其叮叮看人(默然凝视)的习惯据说亦与常年伴随白内障失明的祖父生活相关。众所周知,川端亦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因子成为川端文学生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他说过:“这种精神粮食,除了宋元画之外是不多见的。”关于川端文学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关联性,国内学者周阅的研究获得日本学界的充分肯定。川端康成的文学感受性出类拔萃。1968年10月17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杰出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给世界人民以深刻的感铭”。获奖的作品有《雪国》《千鹤》《古都》《水月》《恋信》等。1968年12月10日,川端康成身着西服正装、挂着文化勋章出席

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第三天即12日中午两点10分,在瑞典科学院,川端身着西装用日文做了获奖纪念演说《序说——我在美丽的日本》。演说中,川端康成引用了道元、明惠、西行、良宽、一休的和歌诗句,配英语同声译。川端康成的人生轨迹跨越战前战后,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些独白式的系于和歌的作品本身,并未受到时代的思想或世态左右,展现了作家自身的艺术观或澄澈的诗性。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神奈川县逗子市的玛丽娜公寓417室含煤气自杀身亡。未留遗书。突然的死给日本国内外带来巨大冲击。近期,日本《读卖新闻》刊出消息,称日本发现川端康成未经发表的临终前书简。书简是写给日本女子大学前校长上代田野的,内容涉及世界和平。川端康成是在1972年4月16日自杀离世,而上代的信落款是1972年3月29日。相隔仅两周。信函内容,正是川端康成与此上代校长商量。川端康成表示,自己能否写出推荐信有些犹豫,但参加活活动义不容辞。当时的川端康成刚住院做了盲肠手术。他同时强调了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认为自己没资格写那样的推荐信。日本学界重视资料和事实,这样新的发现值得庆贺。发现未发表书简并参与调查的是和洋女子大学综合研究机构的深泽晴美主任研究员。她说此书简是“川端临终前的重要资料,与上代的交流显示了川端康成关注的世界和平”。

在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中,死是他恒久关注、思考的一大主题。幼年时代即体验了近亲之死。有观点认为关联于佛经的思考。并非将东方古典佛经当作宗教训诫,而是当作言说东方文学幻想的“世界最大的文学”。旅日学者李哲权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川端心目中的死与海德格尔、黑格尔、巴塔耶、阿甘本、福柯等巨人瞩目的死同构。川端康成涉及死亡的作品有《葬礼名人》《祖母》《十六岁日记》《孤儿感情》《千鹤》《抒情歌》《禽兽》等。惺惺相惜的三岛由纪夫不惜赞美之

辞。他说死亡之于川端康成,并非画上终止符的终结现象,而是巴塔耶所谓的无限时间永远不可能接近。那是超越生物学的生而永远循环反复的植物性的生,是被约定再生的永劫回归之生。所以川端康成完成了《竹取物语》的现代语翻译。如同将佛经称为“世界最大的文学”,他将《竹取物语》赞誉为“日本最高的物语”。

川端康成在《文学的自叙传》中有如下一段话,剖析了川端康成的文学观:“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将经典当作宗教训诫,而尊崇为文学的幻想。我十五年前就有一个构思想写一部‘东方之歌’,写成白天鹅之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讴歌东方古典的梦幻。(中略)西方伟大的现实主义中,也有不畏苦行趋近死亡终得遥望东方者。也许,我也能凭借幼稚的心歌嬉戏。”

限于篇幅,无法介绍国内关于川端康成的研究与翻译状况。最后,拟简单介绍日本著名文学史论家或著名作家的川端评价,有助于客观认识文学大家川端康成。评论家伊藤整认为,将丑转化为美乃川端作品的一大特性。“我忍的直视看穿了丑的本质,最后必然抓住一片澄澈的美,必须向着丑恶复仇。”他说这是川端的“力量所在”,川端康成的两种特质有时会“在一种表现中重叠”,有时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他说:“在批评家眼中,二者对立无法调和,却可奇妙融合使二者有机地结为一体。”基于此,伊藤整分析道,“唯有川端氏拥有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抵达真与美交错的到达点。”川端本人的说法是“无论存有怎样的弱点,持之以恒就会对彼者的安心立命发挥作用。”伊藤整说,“由此可见这位最爱东方经典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又说川端康成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一方面他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交流中”获得成功的批评家,一方面“他又脱离了当时的政治文学和娱乐文学两方面,继承并拯救了大正文坛创发的体现人性的文学”。

三岛由纪夫将川端称作“温情义侠”,从不强买强卖推销善意,对他人不提任何忠告,只是让人感受“达人”般“孤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同时川端的人生全部都是“旅行”,川端被称作“永远的旅人”,川端的文学也反映出川端的人

律、法则。也许真的如托马斯·曼的理念“小说以错误为道路”,完成对人类自我的审视。因为《我这样的机器》最令人同情的正是“伸张正义”的米兰达,她的尴尬之处在于被一个人类制造的机器人所指正。且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亚当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指正就体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器人,这或许才真正是机器人与人类“对抗”的意义所在。而且他是爱着米兰达的,并为她写了很多“情诗”。可以说是遗忘的“爱是有光的/暴露出黑暗的角色”,让我汗颜之余,也令我思考这能否算是机器人的意识与智慧。

与其说亚当获得了意识,不如说麦克尤恩赋予了亚当意识,可能这种赋予在小说中不需要解释来历,只要现实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即可,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意识?意识于人至今都是一个谜样的存在,对于机器人,唯数的机器人,它们的意识算意识吗?而且,亚当的诗可能是最能勾起人们为其辩护的法宝,那么有哲理与“人性”,但这不是亚当的原创,而是麦克尤恩的(未来的机器人可能甚至是必然具有更超乎作家和制造者、设计者所赋予的“主体性”)。那么,在机器人与人类之间,我们隔着一个麦克尤恩,这就让我们真正遇到了对手。也许此处的麦克尤恩只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存在,但现实中却是真正科学与现实的鸿沟。我们在它与他之间徘徊时,也是破除它的进程,找寻我们自己的过程。其内里体现着人类整体意识维度提升的部露。

一切科学的问题最终都会变成哲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法律的问题。科幻小说是对科学未来的一种忧患的文学化,是对科学光环背面的阴影部分的窥探与怀疑。或许作者不能以什么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者而简单划分,抑或根本就搭边,但人性中趋吉避凶与好奇、探索的先天本能会不自觉地作家的目光带入危险与安全的交界地带,先去做一场思想的探险。在文字的不断延展中,使命感油然而生,也使文字能量强大到人类的高度。可能真的“文学的解决就是不解决,没完没了之中饱含同情”,以此来完成小说的使命,但可能这就是小说对亚当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做的最好解答。但读者却一定要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答案,这使我们获得了同情的代价与价值。



川端康成

生态度。三岛由纪夫在《永远的旅人——川端康成氏·人与作品》中解说道,松尾芭蕉在幻住庵记中有如下一句“终无能无才一筋相连”,这也是川端康成作品与生活的最终写照。他说与川端作品的造型细部相比,作品的整体构成最终呈现的是某种造型的放弃,原因是相同的艺术观和相同的生活态度。三岛由纪夫对川端的高度评价是近代作家中唯有川端康成一“可体味中世文学隐藏的韵味即一种绝望、终结、神秘以及淡淡的情色,他完全将之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三岛的评价如雷贯耳,“温和的侠义之人”川端与伪善无缘。普通人很难达到此般“达人”的境界。川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世无争且善于社交,所以也被称作“文坛的总理大臣”。

著名文学史论家中村光夫说,横光利一体现“阳”属于“男性文学”,其文学的内在戏剧性,在《机械》中明显表征为“男性同志的决斗”;而川端康成体现的则是“阴”乃属“女性文学”。某种意义上,横光具有积极的“进取性”,终生在不毛之地进行着艰苦的努力,“有人说他迷失了自己的文学”;相比之下,川端学习了“软体动物的生存智慧”,看似随波逐流却成功地“把‘流动力’降到最小限度。中村光夫认为,川端康成氏作为批评家亦属一流,因此总能看破文坛动向的实质,继而在面对时代潮流时显现为一种逃避的态度,实际上却尤为切实地耕耘着自己脚下的土地。

## 徘徊于它与他之间的我们

□刘海涛

詹姆斯·伍德曾说“同情是小说温柔的使命”。在小说的场域里,同情给人及万物温暖的东西。且在小说辩证性地支撑下,完成对即便“不值得同情的人,宣布善意的判决”。这一点在《我这样的机器》中得到了体现。相较于多数作品所展现的机器人与人类是抗争性的存在体,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则以机器人的视角给予了另外一种可能,从而将整体小说对人类自我的同情提升到友谊的高度。

一句“若正义即对等/那爱上一名罪犯/必不是犯罪”,使机器人亚当栖身于《我这样的机器》中主人公米兰达和“我”(查理)的理智与情感之中,甚至肉体之间。悄无声息中作者伊恩·麦克尤恩将AI与文学做了勾连。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拥有了智慧,有了初始的原罪,那么作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是人类主动赋予了它们智慧的,这是我们的后伊甸园时代的原罪呢,还是AI自产生之初就已经打上罪的烙印呢?

亚当夏娃的名字是否可看作是作者想找寻人类与自我初始的样子的希冀呢?小说中,亚当的性格设置由“我”和米兰达共同完成,多少有一些男性、女性共同造人的味道。其“唯数”的身体、程序中充斥着男女两种因子的“意识”,像极了我们的孩子。也自然引出小说的命题:如何与机器人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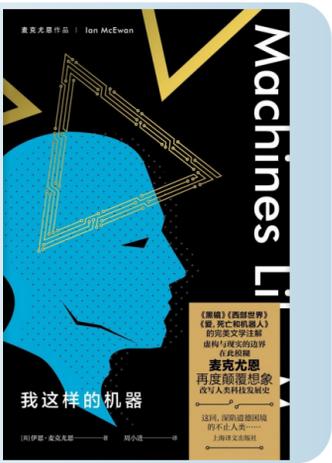
第一章,小说就有大段大段“我”对“另一个我”——亚当的心理体验与纠结,这种体验微妙好似要见到陌生的亲人。而“我”的购买,只是出于好奇。AI机器人的“降临”,如同陌生人造访闭塞的部落,“陌生的美”对于不同的文化、观念认知,可能真实如“侵略”样会带来骚动。这只属于心理的基础层面。从“我”的专业上看,是电子学和人类学共生的产物;作为女性性代表的米兰达,反应似乎过于平淡了些,只感觉亚当像博斯普鲁斯海峡码头的工人。如果性别是体验与认知不同的主要原因,从一开始,无论作者还是小说人物本身,就已经为结局做了背书。

起初,我在想,应该以怎样一种心态来读这部科幻小说。亚当,一个机器人,“我们”的孩子,对它的态度是看作一个机器人、一个造访者、一个不速之客、一个新物种,还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平等的人呢?这本身就给读者提出了要求。因为这里面其实已经融入了如何与机器人相处的问题,也是与作者达成一种神交、默契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名字很

容易诱导成硬科幻来看,如果真的以这个态度去看,从一开始,我们就输给了作者,输给了麦克尤恩,至少不在一个频道上。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甚至觉得这不能算是科幻小说,而应该归类为伦理小说、“言情”小说、人文主义小说。因为我看到每一行字的背后,都闪烁着作者投来的深邃、温暖、关怀、思考的目光。或许从一开始,作者就已经跨过了AI的阶段,而是直接把亚当看作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这个初始与终极的关怀是经过主人公与故事情节逐步演进出来的。

作品与菲利普·迪克的机器人系列形成对应,给我们指出了除对抗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平等、和谐、尊重。机器人是人类自身的影子,AI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投影。因为它是人造的,与其说是探讨与机器人如何相处,不如说根本上回到了与我们人类自身以及皆备于我的万物相处的问题,如何认知自我的问题。小说中的机器人只是给这个认知增加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参照物,一个将我们人类意志、意识、“情感”成型化的所谓“机器”,一个可以将人性之光反射回我们自身的可视的“镜子”。如果说菲利普·迪克的机器人对抗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其根本也是我们人类的意志、道德缺失造成的一种可能呢?

小说中已经部分涉及了这种缺失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我”没能像阿基米德所说“超越自己,把握世界”,米兰达也没有记住机器人“存活法则”——“我们被迫出来,可不能理解谎言”的忠告,致使满以为为被强者的同学玛丽娅姆伸张正义的起诉成为亚



当不可理解与饶恕的说谎罪证。人们一直担心机器人会威胁到人类,但亚当这个善举,又摧毁了人们道德的底线,也暴露了“我”——人类大多数意见的代表者的思想活动轨迹:购买初期,亚当是机器;与米兰达有性关系后嫉妒为机器人甚至“人”;亚当行善“偷走”他挣的钱,让“我”恨他——“一台会走路的笔记本电脑”。就这样,亚当在它与他(它:亚当是机器人;他:亚当是男人)之间让“我”欢喜让“我”忧。

可以说,读该小说的过程,我们是走在它与他之间,走在它向他转化的路上。是否转化、如何转化,由我们自己选择、决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可能亚当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适应人的社会,成为人,甚至好与坏的表现都高于我们;而我们还是在人与机器人间摇摆,对我们有利时,待之以人;不利时,“还原”其机器人本性。给机器人一个名分,如何克服它给“我们”造成的难堪,也就成为我们人类将来一个共同的任务。

亚当的善举是自身的设计者预先植入的,还是数据算法的结果,抑或亚当后天自我学习的结果,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不管哪种来源,这个来源问题决定了亚当们存在的意义与不确定性,包括其他机器人的各种形式的“离世”,都指向了其源头——科学技术的可控性问题。用时髦的话说“算法是有价值观的”。“人们希望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能够拯救我们自己”,但“技术让文明脆弱”。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或即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相辅相成的技术也为文明提供了新的文明出口,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出口处红绿灯在哪里和颜色变换的规

律、法则。也许真的如托马斯·曼的理念“小说以错误为道路”,完成对人类自我的审视。因为《我这样的机器》最令人同情的正是“伸张正义”的米兰达,她的尴尬之处在于被一个人类制造的机器人所指正。且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亚当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指正就体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器人,这或许才真正是机器人与人类“对抗”的意义所在。而且他是爱着米兰达的,并为她写了很多“情诗”。可以说是遗忘的“爱是有光的/暴露出黑暗的角色”,让我汗颜之余,也令我思考这能否算是机器人的意识与智慧。

与其说亚当获得了意识,不如说麦克尤恩赋予了亚当意识,可能这种赋予在小说中不需要解释来历,只要现实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即可,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意识?意识于人至今都是一个谜样的存在,对于机器人,唯数的机器人,它们的意识算意识吗?而且,亚当的诗可能是最能勾起人们为其辩护的法宝,那么有哲理与“人性”,但这不是亚当的原创,而是麦克尤恩的(未来的机器人可能甚至是必然具有更超乎作家和制造者、设计者所赋予的“主体性”)。那么,在机器人与人类之间,我们隔着一个麦克尤恩,这就让我们真正遇到了对手。也许此处的麦克尤恩只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存在,但现实中却是真正科学与现实的鸿沟。我们在它与他之间徘徊时,也是破除它的进程,找寻我们自己的过程。其内里体现着人类整体意识维度提升的部露。

一切科学的问题最终都会变成哲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法律的问题。科幻小说是对科学未来的一种忧患的文学化,是对科学光环背面的阴影部分的窥探与怀疑。或许作者不能以什么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者而简单划分,抑或根本就搭边,但人性中趋吉避凶与好奇、探索的先天本能会不自觉地作家的目光带入危险与安全的交界地带,先去做一场思想的探险。在文字的不断延展中,使命感油然而生,也使文字能量强大到人类的高度。可能真的“文学的解决就是不解决,没完没了之中饱含同情”,以此来完成小说的使命,但可能这就是小说对亚当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做的最好解答。但读者却一定要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答案,这使我们获得了同情的代价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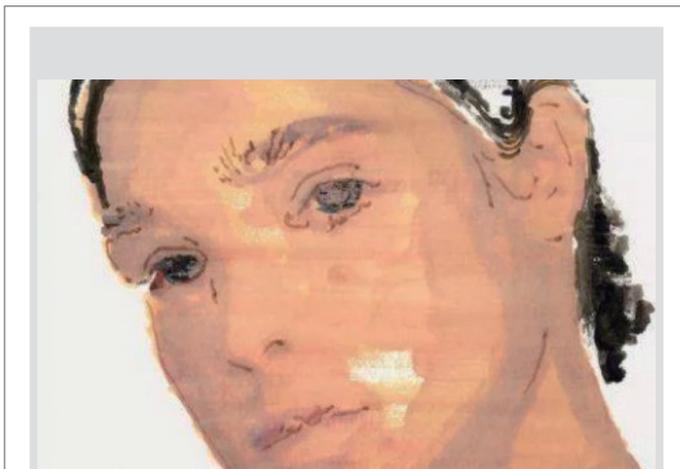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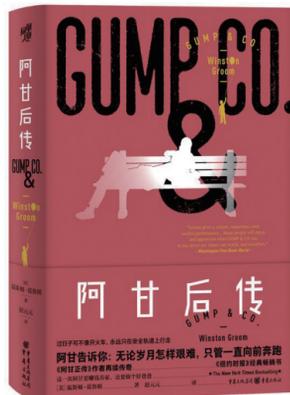
### ■书讯

### 《阿甘后传》出版

近期,《阿甘正传》的姊妹篇《阿甘后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4年《阿甘正传》横空出世,横扫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至今仍稳坐豆瓣电影前三的宝座,此后阿甘成为众多企业家、普通人眼中的经典励志形象。虽然他是一个“白痴”,但是没人仅仅把他当白痴。

现在,这个“白痴”要回归生活了。在《阿甘后传》里,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左右碰壁的阿甘来了。故事接续正传,阿甘开公司却破产了,后来他当过保洁员,当过百科书促销员,还办了养猪场,并将他的荒诞故事一路衍生到了美国上流社会,为读者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社会,映照出了一个荒诞而真实的社会。

美国作家温斯顿·葛鲁姆(Winston Groom, 1943—2020)毕业于亚拉巴马大学,曾做过随军记者,后专业从事写作,作品包括《循环好时光》《逝夏》《阿甘正传》等。他的《阿甘正传》因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多个奖项,产生了广泛影响。(欣 闻)



机械臂绘制的人像作品

##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